

# 浅议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构建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mbol in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郑漫丽

Zheng Manli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 610091)

(Jinsha Site Museum, Chengdu, 610091)

**内容提要:** 一般符号学认为, 全部人类经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支撑的诠释结构。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保护和展示重要古代遗址的场所, 兼顾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 也具有符号的意义和作用。本文拟从一般符号学的视角出发, 通过讨论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特点、属性及其所属三元关系之间的符号问题, 最终为考古遗址公园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上的符号角色塑造提出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符号 三元关系 考古遗址公园 文化遗产

**Abstract:** Charles S. Peirce's theory of signs (semiotic) is considered as a general semiotic theory. All things over the world is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e with sign.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which protects important ancient sites is also a symbol of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by displaying this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 I want to discuss the symbol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s and triadic rel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even the problems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so as to provide some thoughts in symbols shaped of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Key Words:** Sign; triadic relation;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cultural heritage

## 一、概述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一种方式。自《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提出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开始, 考古遗址公园就开始指代那些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重要古代遗址

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 兼顾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文化空间, 并成为加强遗址保护、深化遗址展示与利用的有效途径。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过10年时间, 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热潮。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如何才能让呱呱坠地的考古遗址公园茁壮成长成为文化遗产领域保护与利用完美融合的典范呢? 本文拟从一般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 二、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符号”最初被认为是两个关系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用一物意指另一物来完成传达任务<sup>[1]</sup>。符号学意识的主题性表述和系统说明最早在拉丁时期便已出现，后经语义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概念从人类言语活动已经扩展到人文科学所有对象的社会、历史实践，并经由皮尔斯的研究形成了覆盖多学科的一般符号学<sup>[2]</sup>。因此，符号被皮尔斯定义为：“任何事物，它决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项）指称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它本身以同样方式指称着（它的对象），解释项依次变为符号，而如此以至无穷。”<sup>[3]</sup>

一般符号学研究涉及三个成分，包括符号（sign，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者形成一个三元关系。符号是传达关于其所代表的对象的信息，它把信息传递给入脑，是最为熟悉的再现体；对象是任何或直接或间接地能够被感觉、做出回应或思考的东西，是符号中被再现的任何东西；解释项涉及心智活动，即符号对其使用者或阐释者所产生的效果<sup>[4]</sup>。符号、对象可以是具体的某物，也可以是主体认识。符号一方面被对象决定，另一方面又决定着解释项，三者处于这样一种三元关系中，使得每个解释项都是通过符号的中介与其对象相关（图1）。

由于符号是一个“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sup>[6]</sup>的作用过程，每一种实用物都是在实际使用中逐渐带上符号意义而实现意指作用，解释项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符号学研究的关键，也成为符号作用的支柱，负责协调物理存在和客观存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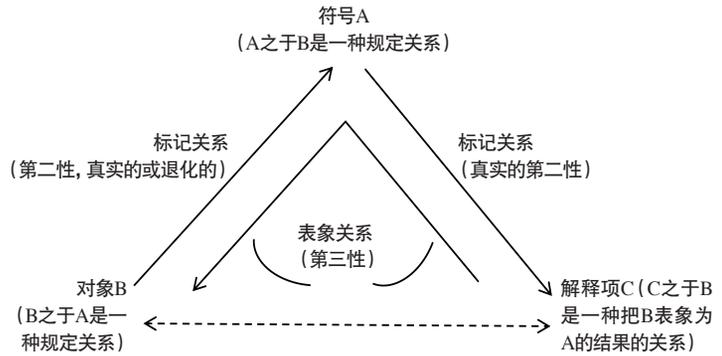


图1 符号学三角的抽象示意图<sup>[5]</sup>

间的差异<sup>[7]</sup>，进而形成新的、更高级符号，开启新的符号活动。解释项必须要有人的因素掺杂其中，这又使得符号在不同认知、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指代非常不稳定，这就造成符号作用具有任意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点。

## 三、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关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sup>[8]</sup>可见，考古遗址公园均立足于园内重要的古代遗址的保护，并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等方式，同时兼顾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根本和核心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符号学的核心，就是认为全部人类经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支撑的诠释结构，符号就是能够承载意义的“物”，我们所说的“文化”也就是这样一种以符号为媒体和支撑的诠释结构。从遗址到出土文物再到考古遗址公园，任何一个“物”的存在都可被视为符号而存在，因而，考古遗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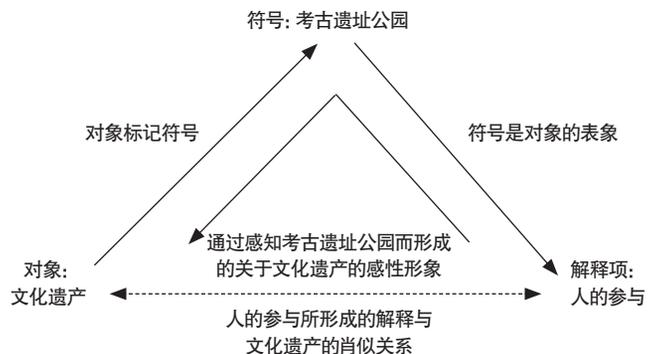


图2 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三元关系示意图

园也可被视作符号。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种符号,其对象就是文化遗产,进入考古遗址公园的人就是解释项中的使用或阐释效果。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第一,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标记关系,即作为对象的文化遗产对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园进行了规定和标记;第二,考古遗址公园还通过一种表象关系作为文化遗产的表象存在,而这种表象过程则源于人的参与形成肖似关系;第三,考古遗址公园决定了解释项的使用和阐释效果,由于社会观念或心智活动的影响,人的参与也左右着考古遗址公园的解释效果(图2)。

#### 四、符号学视角下考古遗址公园的问题

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功能集合体,同时具备科研、教育、游憩等多个功能,因而在建设宗旨和使用目的上会存在较多重点和难点。尽管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的出现时间并不长,作为被文化遗产标记的符号,却和所有符号一样,也具有任意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考古遗址公园”一词原本就是被人为规定为指代文化遗产的符号,会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符号特性。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也会因为符号的历时性特点,在时间的推移下很可能被赋予其他的目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演变为其他对象的符号。此外,考古遗址公园还受到早期出现的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风景名胜等影响,其符号的稳定性势必会更加受限。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在作为承载和表达文化遗产的符号时自然会出现以下问题。

##### 1. 考古遗址公园丧失其该有的符号载体作用

作为对象的文化遗产与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园之间是一种标记关系,受对象的制约,考古遗址公园被文化遗产规定和标记,也就是说,对象是通过符号显性表达和出现。符号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再现体,符号从出现以来,就因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具有任意性的特点<sup>[9]</sup>。而当符号的载体不受对象的制约时,符号对对象的表达将不具有显性,而只能是一个潜在的隐性符号,此时,考古遗址公园将无力作为对象标记的符号存在。如早年建成开放的西安兴庆宫公园<sup>[10]</sup>、圩墩遗址公园<sup>[11]</sup>尽管都是在重要遗址的原址上兴建的园林公园,其园内彰显的内容却主要是公园休闲或风景观光,遗址仅仅是公园内的某种景点点缀,而没有突显出遗址在这处公园当中的重要地位,因而这两处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不能形成标记关系,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公园名称上的再现体。由此可见,无论考古遗址的价值多么重大,当其现状和意义之间并没有因二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超越二者的关系时,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就只为隐性关系,这样的考古遗址公园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符号的意指作用。

##### 2. 作为文化遗产的符号却变成其他形式的指代符号

因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其意指作用也具有任意性<sup>[12]</sup>,因此,考古遗址公园的意指作用也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这就为考古遗址公园有约定和标记的符号意指增加了难度。按一般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在实际出现以前就已经潜在地存在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一些被其他存在和事件所潜在地规定的存在和事件,它们在被如此规定的自身活动中还规定着一系列别的存在和事件,因此,符号可以指代任何一物,也可以主要指代某一物,其意指的对象是极其不稳定的。正如此,从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看,它应只能作为其对象文化遗产的表象,而须避免演变为其他对象的表象。但是,就目前学界对考古遗址公园的讨论和建设实践看,考古遗址公园的指代对象较为广泛且不太稳定,如被推翻的殷墟国家大遗址公园规划即是一例<sup>[13]</sup>,当殷墟大遗址主题公园、周边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区三部分规划中已不见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的踪影时,理应以殷墟遗址这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对象,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殷墟大遗址主题公园变成了指代其他对象主题的符号。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

人们忽视了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而一味考虑现有社会共识下的显性符号特征，此举给考古遗址公园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无人知晓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什么属性、有何功能的场所，而仅仅会因“公园”二字以为这就是一处新增的城市绿地、供人休闲的公园，而忽视了它作为遗址的保护场所，是历史的追思之处，文化的延续之地。其符号意义的形成将严重偏离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

### 3. 符号与解释项的相互制约造成解释效果不尽人意

符号作用是一种动态互动，在符号的产生过程中，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符号产生和演变过程中，当涉及社会文化时，需要人的参与才能让符号和对象之间动态互动引申出解释项，进而形成一次完整的符号意指。我们已经知道，解释项涉及心智活动，是符号对其使用者或阐释者产生的一种感受效果。同时，符号的历时性特点会让同一符号在不同时期意指不同的含义和对象，共时性特点又会为同一时期的解释者提供社会共识下的某种观念，这种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可能造成解释效果不尽人意。考古遗址公园本就是人为制造的符号，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用于表达和展示文化遗产的内涵，它的表象过程受制于人，也就是说，建设者的初衷和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实物理存在状态都受公园建设者、管理者本身的影响。此外，符号中的解释项还受进入考古遗址公园使用、参观或娱乐的人群的影响。这部分人因各自的知识结构、心智活动和考古遗址公园现实物理存在状态的不同会出

现对考古遗址公园不同的解释效果，最终甚至会出现建设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参观者等对同一符号的解释有天壤之别<sup>[14]</sup>。以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该公园位于汶上县南旺镇，地理位置偏僻，建设初期此处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意指对象就是作为文化遗产代表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南旺段完备的运河分水和航运系统，而园内的物理存在状态却是展示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发掘出土物和解读分水枢纽功能的分水科技的水工科技馆平时并不对外开放<sup>[15]</sup>，这不仅大大降低了该公园的使用率，无疑也降低了使用者对符号的解释，甚至会认为，文化遗产就应该是荒凉、陈旧的代名词。而当大明宫遗址公园尺度过大、遗址点联系不够紧密时，使游览者疲于奔走、空间迷失，大大削弱了大明宫整体格局带来的历史感和遗址本身产生的场所感<sup>[16]</sup>。考古工作者看到的是三清殿、清思殿、含耀门、含元殿、太液池、丹凤门、麟德殿、重玄门、蓬莱岛、望仙台、东北城角等地下建筑基址及地上夯土基台及其反映出来的作为唐长安城最重要、最宏伟的皇宫，见证了唐王朝的兴衰更替的重要价值；规划建设者看到的是在保护遗址的整体格局、形制、重要建筑遗存以及地形、地貌等重要物质基础上，结合保护性展示和改善遗址公园内外的环境风貌和生态环境<sup>[17]</sup>；参观者看到的是大明宫微缩景观、造型奇特的局部建筑景观、古代场景雕塑、宽阔的大草坪以及偶尔高耸出地面的小土堆。由于三者之间没有产生显性标记和互动，此时，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园和文化遗产所指代的各类遗迹现象之间仅为关系松散的二元结构关系，削弱了符号与人的相互沟通，阻挡了解释项的进入，符号和对象之间形成的可知性格局可能呈现出潜在状态而给人以空旷、空洞的感觉，不能形成一次完整的符号意指。

## 五、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构建思路

“当今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趋向于最广义地将其理解为包含所有记录人类历史活动和成就的符号”<sup>[18]</sup>，即人们对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经验和知识成为文化遗产（对象）的解释项。鉴于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理应追溯构成指代文化遗产的经验和知识的符号（考古遗址公园）需遵循哪些路线才能圆满实现和塑造它作为符号存在的角色。

首先，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作用归根结底是要回归于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保护与传承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观念需要物理存在作为载体表现，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存在载体也需要表达

某种思想意识。考古遗址公园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文化遗产紧密联系，互为表里，是人为制造的符号。把握对象与符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强调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不背离，这将有助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期的原则约定，如三星堆考古遗址公园、金沙考古遗址公园、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均脱胎于遗址博物馆，就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放在了公园建设的首位。

其次，任何一物都可成为符号，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它指代的其实更为根本和直接，那就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包括文物、遗址和古建筑等。当文化遗产被当作符号看待时，人们更强调其作为文明或文化整体的组成因素与自解说系统的相互关联方面<sup>[19]</sup>。考古遗址公园要成为文化遗产的符号指代，就不能避重就轻，而应着重突出其指代对象的实质内容，不仅要看到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文化遗产的标记作用，还要注意到文化遗产作为符号时其本质上所指代的那些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遗迹和遗物，进而关注到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性指代，即那些遗迹和遗物及其蕴含的人类历史活动、成就所构成的经验和知识。由此可见，在兴庆宫原址上兴建的兴庆宫城市公园没有突显出兴庆宫遗址的标记作用，它可以是景点、公园，却不会成为考古遗址公园。而金沙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初期就考虑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遗址开发与文化遗产传承的关系，公园内完好保留了遗址核心区遗存，展示了重要宗教祭祀遗址现场以及反映古蜀人生产、生活、精神信仰方面的出土文物，也为公园本身的建设做出规划实践，让考古遗

址公园这一概念较好地诠释了符号的根本指代。

最后，符号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将物理存在与心理的理性存在联系起来，这将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实现符号意指作用的关键所在。符号的构建实际上应该是如何让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者、参观者等人群理想当中的根本意义上的符号，即作为一种稳定的表象文化遗产的“自然符号”而存在，同时又让它的物理构成可以引导我们以及后人形成关于它的客观关系的经验和认知。如大明宫遗址公园尽管已非常努力地在指代和标记古代遗址，但在古代文明所蕴含的经验和知识方面缺乏有力表达，使其符号构建显得力不从心。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则较好地利用了遗址的地理优势，较好地保存了盘龙城遗址的现状和历史风貌，并通过遗址局部展示反映商代盘龙城选址于此的战略优势和深远意义，这引导参与其中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关于该遗址客观存在与现状的经验和认知，并进一步加深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认同。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构建就在潜移默化之间形成。

诚然，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并非都如盘龙城遗址占尽建设优势，在我国已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中，大部分公园都面临遗址面积大、遗址保存现状差以及保护难度大的问题，因而在展示利用手段上受到较多限制。要使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文化遗产的自然符号还需要较大的努力。但是，符号作用是一种主体性互动，需要将心理与物理结合起来，并环绕着指号过程的背景和条件形成解释项。人的参与左右着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意义，而考古遗址公园的现状又影响了使用者的使用和阐释效果。因此，考古遗址公园需要让使用者和阐释者有更多的机会平等对话，达成互通的社会共识，并成为阐释者心智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考古遗址公园与人的相互制约力降低到最低点，其形成的解释效果也将达到最佳。

## 六、结论

本文从一般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提出考古遗址公园也属于一般符号学中的符号，其对象是文化遗产，而进入考古遗址公园的人的参与形成了符号的解释项，即符号的使用或阐释效果。通过讨论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特点、属性及其所属三元关系之间的符号问题，认为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性指代是古代人类遗留的遗迹和遗物及其蕴含的人类历史活动、成就所构成的经验和知识，在符号构建中应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标记和存在

载体注重表达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想意识，同时考虑到人的参与，让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解释项形成稳定的符号表象，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意义才能平稳构建。

## 注释

- [1] 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8页。
- [2] 〔美〕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 [3] 徐鹏：《皮尔斯一般符号学初探》，《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 [4] 〔英〕保罗·科布利编，周劲松、赵毅衡译：《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 [5] 〔美〕约翰·迪利著，张祖建译：《符号学基础（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 [6]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 [7] 〔美〕约翰·迪利著，张祖建译：《符号学基础（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 [8]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物保发〔2009〕44号），2010年1月7日。
- [9]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 [10] 李百进、徐振江：《兴庆宫文化遗址公园“初阳门”的设计》，《古建园林技术》1988年第2期。
- [11] 丁国明：《圩墩遗址公园》，《江苏地方志》1996年第3期。
- [12] 〔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 [13] 李文静：《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管理研究》，《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
- [14] 〔英〕蒂姆·科普兰著，黄洋译：《将考古学展示给公众——建构遗址现场的深入了解》，《南方文物》2013年第1期。
- [15] 郭迎亚：《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调查与思考》，《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1期。
- [16] 肖菁羽、陈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使用现状研究》，《华中建筑》2015年第2期。
- [17] 张关心：《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东南文化》2011年第1期。
- [18] 〔英〕费尔登·贝纳德、朱卡·朱可托著，刘永孜、刘迪等译：《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 [19] 章建刚：《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价值与遗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页。